

当代政治学中的比较历史分析*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凯瑟琳·西伦 詹姆斯·马奥尼

李卓 译 汪卫华 校

本文译自 Thelen, Kathleen and James Mahoney,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In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edited by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 – 38. (文集第一章)。

作者简介：

凯瑟琳·西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经济学，曾任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主席；

詹姆斯·马奥尼，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

译校简介：

李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6 级博士生，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科 2017 级博士生。

汪卫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 我们感谢本研究计划的其他参与者对本文先前版本的有益建议。我们同样非常感谢来自 Lucio Baccaro, Nancy Bermeo, James Druckman, Daniel Galvin, Anna Grzymala-Busse, Peter Hall, Alan Jacobs, Rachel Riedl, Ben Schneider, Dan Slater, Daniel Ziblatt 和 Nick Ziegler 的丰富而有益的评论。

比较历史分析在政治学中历史悠久、贡献卓著、备受重视。政治学中的各种新运动层出不穷，它们提倡的各种新研究路径承诺能提出更强有力的新理论，或能提出更严格地检验理论的新方法，在这样一个学科里，比较历史分析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各个世代皆有许多学者选择以比较历史分析为研究路径，比较历史分析持续为使用其他分析工具或研究方法的学者们设定议程——既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质问题上的。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寻当代政治学里比较历史分析的弹性与长盛不衰的影响。我们认为，比较历史分析的持久影响力归功于它所具有的若干决定性特质：聚焦影响深远、大尺度、且通常较为复杂的结果；强调植根经验、深入基于个案的研究；注重讨论政治的过程与时间维度。这些特质不但让比较历史分析表现突出，更赋予了它在其他研究路径中看不到的比较优势。

政治学中方法论的搅合翻腾并不新鲜，过去一些年里甚至愈演愈烈。自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起，理性选择理论步入学科主流，政治学经历了重大变革。运用博弈论的研究工作在强势崛起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批评，支持者夸赞其模型在理论上简洁优雅，反对者则批评这些模型在解释现实世界的结果上作用有限。^① 尽管这一路线上的研究工作并未如预期的那样，让政治学改弦更张，但如今它们明显在这一学科中已占据了重要地位。

最近，另一支经验论取向的研究工作，以相似的冲劲与力道涌现出来。实验方法（其拥趸誉之为一场“因果推断革命”）横扫了很多大学科系。如今，主张实验法的学者极为强调研究设计，他们通常在实验室、实地或线上招募受试者参与实验，试图分离出其所关注的变项的影响（效应）。这一新趋向使学术辩论不再如从前那样，围绕着大样本研究或小样本研究的相对优点展开。取而代之的是，无论传统的

^① 辩论实态可参见 Green and Shapiro (1994) 与 Friedman (1996)。

回归分析，还是基于个案的定性研究，都越来越被一些学者所贬低——他们认为，各类观察式研究在确定因果关系可靠性的能力上都注定陷入窘境（如 Gerber, Green and Kaplan 2014）。实验法的坚定支持者亦郑重地告诫研究生们：忽视这场因果推断革命代价高昂，后果自负。

最后，正当我们写作本文时，“大数据”成了政治学前沿的新口号（如 King 2014）。虽然这个术语含义相当松散，但大数据与更为传统的定量研究的区别在于，它涉及巨大的数据集（通常多于上百万个观察结果），分析数据需要专门化的计算机技术（例如机器学习）。围绕大数据组织起来的研究议程，部分地是由技术进步和新的社会科学基础设施推动的，这些条件令研究者得以收集和操纵大量信息。对参与这一运动的学者来说，重要的是这些新数据源和新技术手段可以拿来解决什么样的研究问题。

在方法争议的大漩涡中，比较历史分析历久弥新、表现突出、生机勃勃。事实上，在如今大家极度热衷于数据收集和理论检验的大环境下，比较历史分析仍能脱颖而出，得益于其坚定不移地聚焦于理论建构，致力于对庞杂的宏观层次的结果进行解释——这正是其他研究路径在经验层面无从把握、只好渐趋回避的领域。比较历史分析不仅是对其他研究方法的补充，更具有其独特的竞争力。比较历史分析源源不断地产出广受赞誉的学术作品，这些作品往往设定了一些理论议程与实质性的研究议程，并被运用其他方法的学者们所采纳——包括那些最新的研究“金本位”的支持者们。^①

接下来，我们将着重讨论源自比较历史分析方法三大核心特质的比较优势，探究其持久影响。首先，比较历史分析的**宏观组态取向**（*macroconfigurational orientation*）

^① 比较历史分析的不少重要作品已在 Mahoney and Rueschemeyer (2003) 中得到了讨论。本章的附录 A 也提供了一份名单，它（不完整地）收录了 2000 年后在政治学各分支中获奖的比较历史分析力作。（我们无可避免地会遗漏一些作品，谨此致歉）。——备注：篇幅所限，译文未列入附录书单，请见原书。

将这一研究路径与政治学经典联系起来，与那些经典著作一样，比较历史分析始终致力于解释大尺度的政治结果或政治经济结果。其次，它聚焦于问题驱动的**基于个案的研究** (*case-based research*)，这一直都是研究议程设定上洞察力的关键来源，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并能激起学界共鸣。再次，比较历史分析致力于**时间取向的分析** (*temporally oriented analysis*)，对于我们理解政治之中的过程与时间问题可以作出独特贡献。通过揭示这三大取向相应得益之处，我们便能详析比较历史分析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将考虑欠缺这些特征的那些研究纲领会损失些什么。在此过程中，我们还会考虑比较历史分析与其他研究路径之间的互补性，探讨其他研究路径的部分内容，如何被纳入了（或可以被纳入），比较历史分析之中。此外，我们还将探讨比较历史分析或可有助于弥补其他研究路径固有弱点的一些方式方法。

一、宏观组态式研究

比较历史分析以宏观组态式研究为其首要特征。这一特征有不同但相关的两个组成部分——“宏观”与“组态”，下文将依次讨论。

宏观取向

宏观意味着关注大尺度的结果——比如国家建设、民主转型、社会不平等的模式、战争与和平等。研究者们通常还会关注大尺度的因果因素，既有宽广的政治-经济结构（如殖民主义），也有复杂的组织-制度安排（如社会政策体制）。比较历史分析的宏观取向也以其对汇总层次研究个案的分析为标志：通常是民族国家，但也有了政治运动、次国家属地、帝国，在少数情况下，甚至还有各大文明和不同世界体系。尽管宏观层次的研究与比较历史分析学脉相关联，但并非为这一传统专擅。例如，许多统计研究者同样试图解释宏观结果，并在其研究工作中聚焦于宽广的结构-制度原因。实际上，对宏观问题的共同关注，能让比较历史分析与定量分析极

大地协同增效。这类协同有助于维护一个成效卓著的研究共同体，让运用不同方法的学者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协作，从而增进我们对从革命到福利体制再到民主化等一大批研究结果的理解（Amenta 2003; Goldstone 2003; Mahoney 2003; Pierson 2000）。

过去，有一些学者把比较历史分析对宏观结果和宏观原因的强调，与其他研究路径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立场对立起来——方法论个体主义主张，政治结果必须要追溯到个体能动者的行动与动机。^①然而，这种区别在比较历史分析的实践中已经销声匿迹了。实际上，宏观理论往往能引导我们注意到微观层面上哪些特定的过程或行为可能才是最重要的、何时才最起作用。例如卡波齐亚对紧要关头（critical juncture）的分析，精确揭示了如何识别那些从结构层面看来属于偶然性的时刻，其间行动者的选择与能动性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Capoccia，本书第 6 章）。同样，宏观理论，如果成立的话，通常会提示哪些具体的微观事件或过程应当（或不应当）出现在特定研究个案之中。作为检验其理论的一部分，对识别历时或跨国大模式感兴趣的比较历史分析学者往往依托档案或原始资料，更切近地检视具体的关键性事件片段或模式，并在某些情况下深入探究特定历史行动者的动机与作为（如 Skocpol 1992; Swenson 2002; Ziblatt 2009, 2017）。

比较历史分析并不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它采取的立场既反映了实用主义考量，又反映了特定的本体论承诺。就这种实用主义立场，李丹（Daniel Little 2012）作了很清晰的表述，即通常仍有可能“就宏观 - 宏观因果关系和宏观 - 微观因果关系作出细致的陈述，而无需遵照‘科尔曼小船’的逻辑，沿着支杆底板上上下下”（Little 2012, 145）。^②虽然宏观层次的论证最好不要同微观说法相左，但宏观层次

^① 作为方法论个体主义的领军人物，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将这一术语界定为“所有社会现象（其结构与变化）原则上都只能在个体（人们的特性、目标、信念）层面上得以说明的学说”（Elster 1982, 453）。对这一术语的起源及其使用上的模糊性的深入讨论，参见 Hodgson（2007）。

^② 李丹指的是科尔曼宏观 - 微观 - 宏观的解释模式（Coleman 1990）。他给出的实例是博帕尔泄漏事件，他认为没必要“把像‘博帕尔化工厂的组织缺陷导致了此次致命的化学品泄漏’

论证的有效性并不要求它们得被分解为个体层次的行为；事实上，将所有过程分解为个体层次的选择与行为的要求，会使得大量宏观研究不可行或不可能。

不过，更为根本的要点是，在结构特征发挥关键因果作用的地方，若坚持将每个结果都追溯到个体能动者的行动和策略，既无益且有损。如完全采用微观取向的研究路径，便意味着将忽视那些只有在更高分析层次上才能得以理解的重要因果过程（Gaventa 1980; Lukes 1968）。比较政治中很多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都指出了系统的特性——结构性变项、大尺度过程或组织性特征通过塑造个体能动者的利益发挥了关键的因果作用。如不了解关键行动者所处的宏观结构环境，就无法理解他们的利益和行动。本书中保罗·皮尔逊（Paul Pierson）的文章就说明了这一点，尖刻地批判了政治学中很多研究由于将政治简化为明显变动不居的个体间互动，从而在根本上漏掉了权力的影响。

因果组态与处境

比较历史分析中的组态成分指的是研究者考虑问题的方式：多种因素如何组合起来，形成若干连贯的、更大的组合、复合体及因果包。这种组态分析特征如此鲜明，理由之一就是比较历史分析中研究的大尺度结果本身往往就是由多项事件和过程汇总组合起来的。例如，若不去分析各种事件和潜底过程怎样构成了革命、民主转型、发展型国家，便无法研究这些现象。

不过，除此之外，组态分析也体现了比较历史分析所使用的一种特殊解释模式。在这一领域，学者们时常通过考察多个变项如何在各式组合或“因果包”中共同起作用，来解释宏观结果（Ragin 1987）。具体而言，这种对因果关系的组合式研究路径预设了复杂性，即假定交互效应（包括两个以上变项之间的相互作用）很寻常，因而单个的因果因素通常必须作为更大组合的一部分来加以分析。比较历史分析

这样的每个主张都分解为具体的、个体层次的举动”（Little 2012, 8-9）。

的研究者即便对单一因素对某一结果的影响感兴趣，他们也会考虑该变项的影响在不同场景中将会如何发生变化。在比较历史分析中，阐明 X 对 Y 的影响几乎总得考虑到 X 运作的“处境”，这就意味着要具体说明与 X 相互作用并塑造其影响性质的其他变项（尤请参见 Falletti and Lynch 2009）。^①

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请考虑一下奥唐纳尔（O'Donnell 1973）如何回答“经济发展是否导致民主”这一经典问题。他的回答是“这取决于”，而后他才着手具体说明取决于什么。不同于经济发展对民主有积极贡献的传统智慧，奥唐纳尔发现，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南美，经济发展事实上助长了严酷的威权主义。他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增长是在一个以不同民众群体被动员起来、技术官僚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为特点的处境中展开的。在这些具体条件下，经济发展成为了压制性军政权的马达。

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者采用组态解释路径，并非因为他们只管因果复杂性，或低估简约性。相反，对于被研究的宏观结果，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者相信，要想分析清楚各种原因的效果，除了置于其发生的处境之中，别无他法。因此，该学派的大多数学者都会强烈赞同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 1997）的观点：为了追求简洁而将某一个案从其处境中抽象出来，会引致具有严重误导性的结果。正如他所言，若这种“去处境化仅是为了删去多余的细节，那它在科学意义上是件好事”；但如果它删掉了关键的变项与交互项，“那就是场科学灾难”（Abbott 1997, 1171）。

互补与权衡

并非所有研究路径都同样适合于处理作为比较历史分析核心关切的宏观现象。不同研究路径是为了解决不同类型的问题，我们应该对所提出与要回答的问题所

^① 关于在定量研究中，对交互效应进行建模和解读的潜力与挑战，参见 Kam and Franzese (2007)。

选择的特定路径进行成本收益评估。我们大致可以认为，所谓因果推断“革命”的一项主要因果关系，便是学者能进行的研究的类型急剧缩小，原本对这场革命抱同情态度的观察者们也越来越多地承认这一趋向（Huber 2013）。实验方法并不适合于我们想要追问的许多宏观层面因与果的问题。强制和笼络对威权政权持久性的相对影响是什么？组织起来的行业在美国政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跨国公司如何影响发展？由于技术、后勤、伦理或财务方面的原因，这些问题都无法用实验来回答。^①

转向实验研究，不仅会歪曲我们所提的问题，而且常会把寻找答案的努力引向一些特殊的轨道，引向那些关于哪些因素看起来具有重要因果意义的特定类型的回答。^② 研究者不可能以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方式，操纵那些我们明知在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宏观因素，如权力、资源、制度、意识形态。^③ 实验研究无法轻易地发现这些因素在因果上前后相继，因为它们根本不适合用这些技术来分析。相反，“信息”是一个特别容易处理的变项，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实地。^④ 改变信息（如数量、内容、“框架”）的实验相对容易设计，而且实施成本低廉。因此，相当多的实验研究都在探究基于信息的变项的影响，其研究发现往往是报告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操纵信息的各种处理所产生的影响（或无影响）。除了由此进行的实验就其本身而言是否成功（例如是否避免了“启动效应”或其他陷阱）的问题之外，信息（或

^① 李帕特（Lijphart 1971: 684）多年前就已指出，实验法“由于其在实践上与伦理上的限制，在政治学中的运用会非常有限”。

^② 对于政治学中实验法的优势与弱点的评估，参见 Morton and Williams (2010) and Druckman et al. (2011)。

^③ 人们可以用某些试图模拟宏观结构性因素的方式在实验中操纵研究处理对象。例如，一项研究试图弄清楚领导者的地位是否影响了他/她引发合作的能力，研究者就通过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游戏来设定参与者的“地位”（Eckel, Fatas, and Wilson 2010）。不过，人们通常不能真正地操纵宏观结构性因素本身。一个罕见的例外可参见 Beath, Christia, and Enikolopov (2013)。

^④ 我们感谢本·施奈德（Ben Schneider）对这一观点的贡献。

适合用基于信息操纵的那些变项) 实际上可能是其最终所关心的研究结果的一个次要决定条件。

因此, 让比较历史分析生机勃勃的是各种宏观层次的关切, 从这一视角来看, 本学科中更令人遗憾的趋势之一就是基于方法和数据来选取研究问题 (参见 Shapiro 2004, 2014)。我们都知道醉汉在路灯柱下找钥匙的故事——“因为这里光线最好”。过去, 这个故事被援引为一项警告——无论研究可能会把你带向哪里, 都要追究感兴趣的现象的原因。然而, 如今一些学者建议, 我们应该发掘那些适合“摩登”方法的问题, 要在数据最丰富的地方找答案。他们建议我们放弃那些或许意义重大、但在经验研究上棘手的问题——并摒弃其可能的答案。换言之, 一些学者热心地教导我们要去路灯柱下找答案, 并警告我们, 在黑暗中摸索得不偿失。^①

然而, 这样收窄研究问题代价高昂。我们已经看到, 某些领域的经济发展研究如何被简化为项目评估反复操练 (Deaton 2014), 对美国政治的研究又是如何变得更加聚焦于公众舆论和选举行为 (Pierson 2007)。这些发展趋势与对观察性研究的怀疑态度齐头并进, 使得一些学者发誓远离宏观层次的结果和复杂的制度组态 (因为它们徒添混淆, 无望澄清), 而希望将注意力聚焦于能设计出实验或能组装出大样本数据集的若干狭窄问题上。然而, 人们不禁要问, 在光线最亮的地方寻找答案, 是否真的能捕捉到最重要的解释。例如, 现成的民意数据 (越来越多地与问卷调查实验相结合) 推动了围绕着个体公民说自己想要啥的行为研究的显著复兴。即便我们由此对人们所思所想有了更多了解, 公民偏好并不必然是我们希望解释的许多结果的主要驱动者。正如美国严重恶化的高级不平等 (high-end inequality) * 看来便

^① 对这一观点的贡献, 一位著名美国政治学者在其评论中用这种方式引述了路灯柱故事, 我们感谢保罗·皮尔逊向我们提示了这一观点。

* 特指社会中的财富分配高度集中于金字塔最顶端的一小撮富人的趋势, 以至于富裕阶层的其他组成部分、上中产的相对衰落, 以及一般中产阶级的消失。——译者注

很难追溯到选民的偏好。同样，诸如中国政治经济令人激动的转型，遍布世界各地威权政权让人沮丧的持久，也很难与普通公民的微观态度与偏好联系起来。

我们再来看看比较历史分析的组态部分。前文曾指出，比较历史分析通常要对假定了复杂因果交互项的理论进行评估，且事实上也常常将此类组态置于分析的核心。一方面，关心植根于具体个案的组态，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将比较历史分析与统计学研究区分开，后者通常更为关心对特定变项的平均效应或大量个案之中简单的互动项进行估计。但另一方面，比较历史分析也确实可以与同样关注宏观层面结果和变项的统计分析实现强强联手。正如利伯曼在本书中所指出的，将传统的回归分析与经系统选取的若干个案的近距离分析相结合，收益良多。统计学研究往往有助于识别各单个变项的宽泛模式，而比较历史分析则能识别这些变项将如何在组态中共同作用、在具体个案上生成结果。反过来说，比较历史分析关于特定个案集中因果组态的研究发现，也能刺激对统计假说的检验，以识别这些组态中所含变项的一般性影响。

相比之下，实验研究不能轻易地与比较历史分析相结合，以共同实施一项聚焦于宏观（往往是宏观历史）结果的合作研究。利伯曼这一章表明，这两种传统当然可以相互启发，不过他也明确指出，在经验社会科学的关键维度上，比较历史分析与实验方法分踞对立的两端（参见本书图 9.1 中的立方体）。从基础层面来讲，实验研究的目的一一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同时，分离出单个处理变项的影响一一与大多数比较历史分析秉持的更为讲究组态的路数相冲突。从研究设计上来说，实验研究倾向于产生离散的研究发现，它们很难简单“相加”，直截了当地阐明更为复杂的因果互动关系。^① 因此，尽管可以在微观层面上应用宏观比较历史分析研究的见

^① 在对艾伯特·O. 赫希曼的赞誉中，福山（2013）点出了实验研究的有限性——哪怕是在实验法大行其道的发展经济学中。他注意到，实验对于项目评估这样的狭窄目的而言有其用处，但在理论发展上则不然，因为这些结果“无法汇总为对于发展这样更宽泛的现象的理解。除了概念性的东西，难以想象出自这一路数的所有研究半个世纪后还能给我们留下什么（93 页）”。

解——例如，用实验来检验一套组态式比较历史分析解释的某些方面或组件——但个别实验离散的微观结果不能被“加总起来”，以解释比较历史分析学者通常所聚焦的宏观结果。

汇总个别实验结果上的这些困难，部分地与大家所熟知的处境和外部有效性问题有关。虽然实验研究的设计是要通过对处理（treatment）的随机指派来控制各种因素的影响，但其发现仍受制于开展研究的具体环境。在当代政治学中，这些发现能否以及如何超越这一处境并得以推广，通常相当棘手。在一个跨国回归研究经常被诋毁的时代，重要的是得承认，回归分析研究往往避免了将其结果推广到不适当的处境中，或提了个大问题却——一旦被转化和分解为一个可行的实验或“博弈”——得出了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且通常是更小的问题的结果。

归根结底，实验研究可以补充但不能代替比较历史研究所进行的宏观组态研究。事实上依其定义，实验研究本就可能错过诸多系统性特征，即我们所熟知的包括各种制度领域间的联系在内的政治生活诸多重要成分。此类研究还会系统地错过复杂的互为因果的反身过程（reflexive processes）和动态，即随着时间推移且在不同的制度竞技场上，各种“原因”和“效果”相互构成。正如金里奇写的那一章所示，埃斯平-安德森有关福利体制研究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它如何识别复杂的因果“综合征”、反馈效应及其跨领域历时间的连贯性。如果我们把一切都简化为简单的二元关系，或者一次就考察一个具体的自变项，很难想象福利国家的研究将会多么了无创意。^①

在实验研究一系，比较历史分析与各种自然实验有更多的互补性。^② 两者都采用了立足于精心匹配案例的相似的比较逻辑。此外，基于自然实验的研究，就像大

^① 与之类似，资本主义多样性这一研究框架（Hall and Soskice 2001），已激发了大批成果丰硕的研究，也是明确围绕着政治经济体复杂的系统特征组织起来的（如 Iversen and Soskice 2001, 2006）。

^② 正如利伯曼（本书第9章）所指出的，这一点对于匹配技术、断点回归分析等准实验研究

量比较历史分析一样，通常试图在某一特定个案之中理解一个变项对于宏观结果的影响，而非就某一宽泛的总体推广其平均效应。然而，政治学中符合真正的自然实验严苛标准的自然实验少之又少（Dunning 2012; Sekhon and Titiunik 2012）。相反，学者们考察的是在若干关键维度上相匹配的案例，它们往往不能完全符合对处理作“犹若”随机指派的假定。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自然实验研究可以从比较历史分析的工具箱中受益匪浅，因为这些工具正是被设计来对不能被理解为真正的自然实验的案例作出推断的。

二、基于个案的研究

比较历史分析的第二个特征便是**基于个案的研究**。这一特征所强调的是，比较历史分析向来聚焦于解释所观察到的（通常是特定时空中的）结果，并通过提出若干识别让这些结果得以可能并生成的各种因果机制的解释达到这一目的。这一取向也可分两个单独的成分：（1）聚焦真实世界中的谜题，（2）使用基于机制的解释。

真实世界中的谜题

比较历史研究是**问题驱动的**，它因真实世界中的问题而生动起来，这也是为什么比较历史分析学者被锚定于特定时空的经验性谜题所吸引（Pierson and Skocpol 2002; Shapiro 2004）。他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许多在关键维度上相似的案例，却在研究者感兴趣的依变项上展现出相当不同的结果。玛雅·都铎（Maya Tudor 2013）在其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大相径庭的政治轨迹的分析中所采取的便是这一研究路径。另外，比较历史分析学者可能还会问为什么看似不同的案例却有相同的结果。这是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卢坎·韦（Lucan Way）（2010，以及本书第4章）在分析竞争性威权主义时遵循的主要策略。当特定案例与现有理论或大样本

设计同样成立。

研究的预期不一致，真实世界中的谜题亦可由此表达出来。例如，阿图尔·科利及其合作者（Kohli et al. 2001）探讨了为什么印度尽管贫穷、族群上多样、地域上分裂，但它的民主制度仍能长期维持。

因此，大多数比较历史分析都受到某些范围条件的界定，这些条件划定了理论所适用的案例范围。识别这些范围条件也是阐明研究者相信其立论赖以成立的处境（即具体的变项组态）的过程之一部分。因此，与其在所有时空场景下追问平均而言战争是否导致了国家建设，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者更典型的问法是，对于某一具体处境中的一些具体案例而言，战争是否有助于国家建设（如 Centeno 2003）。

然而，无论在广义还是狭义上界定范围条件，高质量的比较历史研究都极为强调**正确把握案例**——也就是说，要对个案有足够深入的理解（通常是基于不同类型的原始证据）以便在相互竞争的假说中作出裁定。与利伯曼（本书第9章）所说的出于例证性或启发性目的的“迷你案例”不同，比较历史分析研究中一个好的答案，必须能在人们引入手头个案或案例的更多细节后，还能经得起推敲。当这些案例再次或被其他学者（包括专家）近距离考察时，对特定经验性谜题的解释不应土崩瓦解。这就要求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者，应在其研究问题的相干案例的各个方面成为专家。

在比较历史分析中，正确把握案例不仅是有效解释的要义；对实际（而非程式化）案例的深入理解也是得出全新解释的法门。近距离研究使学者们能够鉴别新的解释性命题，这些命题不会呈现在迷你案例中，也不会出现在围绕着根据事先定好的自变项对案例进行编码组织起来的研究中。举个例子，想想彼得·斯文松（Peter Swenson 1991）对发达工业世界中“民主法团主义”起源的研究所带来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量文献记录了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力度与涉及工资平等与其他结果的全国性三方谈判的发展之间有强相关关系。劳工问题领军学者

们推测这样的结果是劳工力量压倒资本而造成的。在对这些争论中最关键的两个案例（丹麦和瑞典）进行周密分析的基础上，斯文松颠覆了传统智慧，揭示了特殊的企业界分段方式才是推动集中化的首要搬运工。这项研究鼓舞了新一轮卓有成效的进一步研究（既有定性的也有定量的），对雇主在制度安排起源上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关键性的洞见，而传统上这些制度安排只是被简单地归结为劳工的力量。无论学者们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发现，斯文松基于案例的细致研究激发了一个更为宽泛的研究纲领，使我们了解了大量有关雇主偏好和发达民主国家关键政治经济制度的起源与再生产背后的政治的情况（例如 Broockman 2012; Iversen, Pontusson and Soskice 2000; Mares 2003; Martin and Swank 2004）。

除了在生成新的因果主张方面的作用，比较历史分析还产生了具有广泛适用性的概念创新。近期对不同制度变迁模式的研究——比如希克勒（Schickler 2001）对分层的研究、哈克（Hacker 2005）对漂移的研究、西伦（Thelen 2004）对转换的分析——皆为例证。这些概念的发现和细化都出现在对特定经验谜题的详细分析的语境之中。例如，就漂移而言，哈克对美国社会政策的周密分析就挑战了大众社会项目抗拒紧缩的传统智慧。尤其是，他指出，面对社会或市场处境随之发生的转变，一项政策若得不到更新，其影响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这些情况下，“什么都不做实际上就意味着做了什么，因为稳定的政策规则会产生不断转变的政治结果”（Hacker and Pierson 2010, 2）。像转换和分层一样，漂移这一概念——虽然植根于具体个案且最初也是在个案中被观察到的——同时被更广泛地采纳和应用了。关于漂移的研究不仅启迪了新一轮的社会政策研究，而且还被应用于解释从欧洲的公司治理改革（Cioffi 2010）到日本的企业与国家关系重组（Vogel 2006）的各种结果。^①

^① 除此之外，杰出的博弈论学者已迅速地把哈克的漂移概念形式化了。参见 Callander and Krehbiel (2013)。

简而言之，通过解决真实世界中的谜题，比较历史分析研究经常提出新洞见，进而创造新理论。这些洞见被不同方法论取向的学者采纳后，可以激发更宽泛的研究议程。还有一些比较历史研究者可能会试图用新的历史材料或新的案例来评估最初的论点。统计研究者可能会试图用大样本数据集来检验论点的通用性。理性选择学者可能会试图用他们的分析与方法论工具箱来阐明新理论的微观基础。各种方法论取向的学者在研究广泛的经验问题时，都可以通过应用出自比较历史分析研究中的可移植的概念和机制，就自己的案例获得新洞见。需强调的关键点便是，局域解释对生成新理论既有力也有用，而这些新理论可以为大批学者设定研究议程。

经验性机制

比较历史分析追求解释真实世界中的谜题，由此产生的各种解释之中，注意力集中在阐明在特定案例中原因与因果组态得以发挥影响的各种**机制**。比较历史分析中，学者们根据是否能识别出解释各种联系的机制，一定程度上将碰巧相关与因果联系区别开来。若找不到机制，研究者可能会认为潜在解释是虚假的，从而予以排除。因此，在比较历史分析中，仅展现所假设的原因与结果跨案例共变是不够的。研究者必须通过打开黑匣子，并识别出把观察到的原因与结果联系起来的各步骤，给出这样的共变为何发生的理由。

与基于个案的研究一致，比较历史分析学者通过在个别案例层面观察机制来对其进行研究：机制需在经验上被识别，而不应被简单地假定为貌似合理。研究者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事先预料到具体的机制且积极探索它们的存在；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一些理论创新，都是在解释不符合现有理论的案例的过程中被揭示出来的。真正的要求是，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者成功地识别出具体的联系过程，并以充分的细

节说服别人——包括个案专家——相信最初假设的一组因果要素确实导致了结果。这种扎根于经验、基于机制的解释需要挖掘细节，因而要求深入理解所分析的案例。

作为这种解释的一个例子，请考虑吕舍迈尔（Rueschemeyer）和两位斯蒂芬斯（Stephens）合著的《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1992）。他们遵循了一条源远流长的研究路线，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之间的联系。然而，细考各国情况后，他们发现发展对民主的影响取决于干预机制。例如，之所以在历史上欧洲许多案例中发展有助于民主，是因为它增强了亲民主的工人阶级，削弱了反民主的土地精英。然而，在当代拉美，工人阶级并不总是以民主为导向的，其后果是发展往往并未孕育民主。因此，通过经验性案例分析，他们不仅提供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发展有助于民主的机制的证据，还就在何种具体环境下发展有助于民主提出了新的假说。

对个案内经验性机制的关注与比较历史分析中过程追踪的使用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这个领域的学者们通过在个案层次上追踪把初始事件与后续结果连接起来的过程，提出并检验各种替代性解释（Bennett 2008; Hall 2006; Mahoney 2012）。为确定共变的因素是否确实在因果上相关，比较历史分析学者进行过程追踪检验，其间具体的个案内观察结果（一般关乎经验性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证明或反驳因果假说。为了确定这些个案内观察结果，对该个案历史的深入了解往往必不可少。这些观察结果，在解释为什么两个变项之间的关联本质上是或不是因果性的方面最有用处，而具备个案专门知识的学者，在定位这些观察结果上占有巨大优势。

通过对有关机制的个案内观察结果进行过程追踪得出的发现，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者便能就有关特定案例的假说的有效性得出强有力的结论。同时，对个案内机制的过程追踪，有助于提高比较历史分析的理论建构能力。例如，斯莱特、史密斯和奈尔（Slater, Smith, and Nair 2014）便反驳了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6）关于经济不平等有助于军事政变的发现（另见 Haggard and Kaufman

2012)。他们之所以有与阿塞莫格鲁、罗宾逊相反的发现，是因为其对个案的过程追踪表明，军队之所以采取行动并不是为了经济精英，也不是同经济精英一同行动。相反，他们发现在他们的案例中起作用的机制与孱弱的国家制度相关：经济不平等和衰退进一步削弱脆弱国家并激怒了不高兴的军官，从而造成了政变。简言之，用过程追踪对解释进行评估，通常同个案层面对因果机制的经验分析“手拉手”。对这些机制的分析，既服务于对有关这些案例的理论检验，也可用来建构新的理论，包括那些往往超越所研究的案例“迁移适用”或推而广之的理论。

互补与权衡

将比较历史分析对待经验案例的路数与其他分析模式进行对比是有益的。在许多形式建模研究中，经验案例常被用来例证或展现演绎派生而成理论的似真性。例如，在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关于民主的研究中（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6），经验案例起到了例证作用。它们以高度程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像一些小插曲，其目的是为更宽泛的（“一般的”，也因此往往相当抽象）命题——该项研究中是围绕着“精英”与“公民”的互动旋转——提供例子。实际上就其设计而言，旨在例证理论的经验草图不会将理论置于危险境地，也不会生成或可用于精炼或改进理论的额外洞见。由于它们在分析中并未真正“起作用”，作为例证的程式化案例向来不会深入到足以阐明理论背后的因果机制，从而再产生可供他人跟进的精确可检验的假说。

与之相反，斯文松基于案例的分析提供了具体的命题——例如，“经济中受保护的部门与暴露无遗的部门雇主之间的利益冲突，而非阶级冲突，驱动了法团主义的发展”的假说——这显然邀请或激发了其他人作进一步探讨。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观点可能有悖于直觉。逻辑上来说，理论越“通用”，才能鼓舞更多的研究，相应的研究纲领越富有成果。但我们的建议近乎完全相反：比较历史分析传统中基于个

案的出色研究会刺激进一步的研究和应用，因为它提供了特别清晰且扎根经验的因果主张。这种具体性（而非主张的“幅度”）才是引得其他研究者接受、检验、精炼、拓展并最终确认或拒绝初始发现的原因。

这种解释取向的优势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相当一部分实验研究采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路数，将解释的目标简化为确定平均处理效果。正如其他观察者也指出过的，虽然实验研究可以很好地测量处理效果是否出现或其规模，但往往不能打开“黑匣子”，并呈现这种处理为什么会带来这种效果。然而，在一篇文如其题（“关于‘黑匣子’实验，已经够了”）的文章中，唐纳德·格林和合作者们拒绝了像“未阐明将特定处理与特定效果连接起来的因果机制”这类批评意见（Green, Ha, and Bullock 2010）。对他们和其他人来说，弄清楚 X 是否对 Y 产生某种影响是此类操练的重点； X 为什么会影响 Y 的问题是个二阶关切，有待以适当方式解决，但并非一阶优先的问题。^①

通常实验主义者心目中的模型是医学研究中运用的那种科学类型，即往往无需知道 X 为什么会影响 Y 。例如，在足够多的临床试验中，如果一种药物有助于消除某些症状，那么它为什么有这种效果可能就是次要问题。然而，在政治世界中，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无法操纵“治疗/处理对象”，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个特定原因会产生某个特定效果，那问题就相当严重了。^②不能阐明 X 影响 Y 的机制，就意味着我们无法预料这种关系是否会被其他条件（即，被“处境”）所改变。如果不理解 X 何以影响 Y 的理由，那么在不同的处境中，当 X 未能影响到 Y ，

^① 有关以实验法研究中介变项面临的挑战（以及这样做会牵涉到的间或极为艰巨的假定），参见 Imai et al. (2011)。

^② 这是迪顿（Deaton 2010）对发展研究中的使用随机受控测试实验的批评意见的关键所在（也参见 Deaton 2014）。他认为，尽管随机受控处理能帮助我们决定特定项目是否有用，但它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有用。因而他主张应将研究焦点转向调查那些能解释为什么以及在何种处境中项目有望促进发展的（可推广的）机制（Deaton 2010, 6）。

甚或反而造成了未曾预料到的 Z，我们通常也会感到困惑（另见 Woolcock 2013）。因此我们同意斯托克斯的观点，他主张“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因果效应若无法被解释，就无法被识别”（Stokes 2014, 51）。^①

当代政治学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热衷于理论检验。新洞见从何而来，新理论的种子从哪儿破土而出，这个问题往往在这样的狂热中迷失了。虽然政治学人越发装备精良，可以使用更为严谨的方法来检验现有理论，但当他们的研究发现了异常现象或意外的无效结果时，便往往会陷入迷茫。这时，探究解释往往就成了特别对待，研究者们忙不迭地弄出一些与数据相符的故事罢了。

转向大数据的趋势可能会加剧当代政治学的理论构建问题。理性选择分析因问些“理论驱动”的问题而饱受批评，摆出来的问题，正如夏皮罗所说，往往是“研究者的理论优先权的古怪人造物”，因此其答案“除了那些跟这些优先权绑在一块儿的人之外，对其他人毫无说服力”（Shapiro 2004, 22-23）。实验研究因问些“方法驱动”的问题而受到批评，这些问题只会产生些不重要的发现（Huber 2013）。尽管大数据运动可能会避免大规模“远距离求证”（fishing expeditions）这一最坏场景，但很难想象它将如何避免“数据驱动”的研究纲领。学者们在习得操纵大数据集所需的技能上已投资甚巨，可以理解，他们很可能被那些能让这些来之不易的技术手段有用武之地的的问题所吸引。

比较历史分析并非主要地依据一套单一元理论、一套特殊的方法或特定的一类数据来界定自己。这个阵营的学者们在这些方面通常相当务实，甚至是机会主义的。相反，比较历史分析从周遭世界所表现出的经验性谜题中撷取研究问题，学者们往往特别容易被那些不符合主导理论说辞的案例所吸引。我们认为，这种取向说明了比较历史分析长期以来在产生新的理论洞见方面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而围绕

^① 斯托克斯认为实验研究之中总会有未被观察到的互动效应；平均处理效应掩盖了或许高度相干的亚群体之间的变异。从一种怀疑立场来看，“无法观察的互动项总是威胁到基于实验数据所作的因果推断的意义”（Stokes 2014: 47）。

这些新的理论洞见会形成更广泛的研究共同体。斯蒂芬·哈格德(Stephan Haggard)写的那一章就提供了一个例子。他梳理了“发展型国家”这一庞大而富有成果的研究纲领的出现,学者们牢牢抓住了那些引起对长期存在的正统观念即国家有“害”于发展的质疑的案例。凭借对像日本、韩国这样特殊的政治经济体运作方式的深入理解,他们创造了新的理论洞见,引入了新的概念,提出了新的理论,继而刺激出一个跨越世代、跨越方法的庞大研究议程。诸如此类的发展表明,有时只要看一看比较历史分析所激发的研究,便能充分领会比较历史分析的价值——当然,其中也包括了综合利用各种不同方法的学者的贡献。

三、时间取向的研究

比较历史分析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特征就是**时间取向的研究**。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者假定,有关受时间限制的过程的研究,对于有效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中的政治结果至关重要。其理由是多方面的,它们超出了建立因果性必然涉及的要确认假设的因在果之前这一显而易见的要点。时间分析的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反映了这样一种本体论:(1)时间定位塑造了各个变项的效应;(2)原因和结果的时间结构对解释和分析而言至关重要。让我们逐一考察这两点。

时间定位

在比较历史分析中,一个变项的效应可能取决于它的时间定位(如 Pierson 2004)。同一个变项可能会产生不同效应,这取决于相对其他过程和事件它在**何时**发生。因此,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者密切关注各变项出现的次序,以及它们相对于彼此出现的时机。事实上,将一种解释置于“处境”之中往往意味着把变项置于特定的时间背景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比较历史分析中的解释是组态性的,不仅因为它

们考虑了在给定时间运作的各种原因组合，而且因为它们考虑了位于不同时间点的各种原因组合（见 Falleti and Mahoney，本书第 8 章）。

把原因置于时间中，这一洞见是有关政治中的路径依赖重要文献的中枢。不同学者有时会采纳略微不同的定义，但贯穿几乎所有这种研究工作的一个核心主张是，在一条路径依赖次序中早期的事件比后来的事件对结果发挥了更强的因果影响。^① 伴随着回报递增过程，早期可行、但未被选到的选项会逐渐消失，因为行动者会围绕“所行”的路径组织他们的策略，随着时间的推移，恢复原状会变得越来越困难（Pearson 2000）。权力的动力学也会遵循类似的逻辑：早期的赢家可能会获得资源和其他优势，令输家难以卷土重来（Mahoney 2000; Pierson 本书第 5 章）。这类路径依赖的继起之事可以长期锁死结果，包括不合乎人类重要利益或目标的次优结果。给定路径依赖的可能性，比较历史分析领域的大量工作都聚焦于识别历史转折点或紧要关头，彼时的初始决策或事件的发生启动了这些继起之事。这些历史时期掌握了可以解释该长期模式如何迈出第一步的选取过程和原因。

另一些比较历史分析论证则分析了彼此相关的多重过程如何展开。这些论证要求格外注意时机和排序对所关注的结果的影响（Grzymala-Busse 2011）。例如，可参考图利阿·法莱利（Tulia Falleti 2010）对拉美各国权力下放改革的研究。行政权力下放改革既能给州长市长赋权，也能削弱他们，这取决于他们在权力下放改革整个次序中的位置。同样地，看看斯考罗内克（Skowronek 1982）对“东拼西凑”的美利坚国家体制的里程碑式研究。斯考罗内克表明，由于美国在工业化和官僚制形成之前已有了强大的民主政治，政党就能够对新兴的现代国家的形式施以相当可观的控制。于是，美国的国家体制就不是像一套高效且理性的官僚制那样发展的，

^① 路径依赖作为制度变迁各种形式的分类法的一部分，被指派了不同的意义，有关讨论参见 Rixen and Viola (2014)。

而成为了相互竞争的若干控制单位错综复杂的混合物，这些控制单位又是随着时间推移，各派党徒零零碎碎地引进来的。

排序论证的另一个变体涉及对局势（conjuncture）的分析，局势即两个或两个以上原因适时一块儿出现。交汇的精确时机，对于该局势的效应或许事关重大。例如，林登·约翰逊的“向贫困宣战”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城市骚乱历史性的“碰撞”，有力地塑造了美国社会政策的政治命运。新推出的社会计划转而解决这个国家穷困潦倒的各大市中心非裔美国人的麻烦事儿，“强化了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补救性焦点，且……鼓励了隔离的、以种族为焦点的各种计划”——这些发展使得这些政策长期处于政治上的脆弱地位（Weir 1992, 165-6）。

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者对时间定位的影响很敏感，因为他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研究的个案，并将其置于逐步展现的事件次序的处境之中。事实上，这一取向对比较历史分析的有效解释至关重要。因此，绝非巧合，比较历史分析研究者开发了许多用于研究时间定位的最强大的分析工具：紧要关头（Capoccia and Keleman 2007; Collier and Collier 1991; Slater and Simmons 2010; Soifer 2012）；路径依赖（Alexander 2001; Boas 2007; Mahoney 2000; Pierson 2000）；以及时机、次序和局势（Abbott 2001; Aminzade 1992; Büthe 2002; Grzymala-Busse 2011; Pierson 2004; Rueschemeyer and Stephens 1997）。这些工具提供了在比较历史分析中框释和组织解释的若干概念，也为比较历史分析作品提供了基础。例如，人们可以根据它们采用了紧要关头的路数还是分析路径依赖过程，把比较历史分析研究彼此区分开。实质内容迥异的作品仍能彼此交流，因为它们在系统阐述其解释时，都使用了相同的时间构念或采用了相同的分析 - 时间框架。

时间结构

比较历史分析还明确承认变项和过程本身具有时间结构。一个给定的因果要素或一个给定的变迁过程可能会在持续时间或速度上发生变异，这些变异可能会产生重大后果。^① 因此，人们不仅要问某个过程或事件是否在给定的强度下发生，而且还要探究其发生的时间维度。一个给定过程展开的速度有多快或多慢？一个给定事件持续了多长时间？一个因果过程的速度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既是因为时间结构可以塑造因果效应的形式和性质，也是因为事件和过程的时间结构本身就是值得解释的重要结果。

比较历史分析关注时间结构意味着，这一研究传统的作品注意到了渐进的、缓慢移动的且难以看到的因果过程。本书中皮尔逊写的一章提供了多个权力动力学运作的例子，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选项、议题或观点一同被“有组织地运作出了政治”。权力的这些“隐秘”维度，只有通过考察它们随着时间推移而展开的过程才能被看到；在采用短时间范围的研究中，它们仍是看不见的。大量比较历史分析研究具有更宽泛的时间范围，这也使得分析者能够复原其他方法都难以捕捉到的远端因果过程的影响。例如，在雅沙（Yashar 2005）的研究中，促使拉美原住民抗议的因果过程在几十年间渐次展开。雅沙表明，最初为将印第安人转变成国家公民而建立的法团主义结构实际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它们通过提供原住民社区将族群裂隙去政治化。结果，当新自由主义改革慢慢侵蚀这些保护措施时，身份认同被重新政治化，以原住民组织和抗议浪潮告终。因此，或许看似突如其来的反抗，实际上最好被理解为法团主义时期终结后缓慢移动的因果过程的产物。

比较历史分析传统的其他工作表明，当一个给定的事件或过程长期持续时，它更有可能触发一个引爆点或启动一个扩散或积累的过程（Grzymala-Busse 2011, 1279）。一个实质性的例子是胡贝尔和史蒂芬斯（Huber and Stephens 2001）对社会

^① 在皮尔逊（Pierson 2004）对于时间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中，这一洞见居于中心地位。它同时也被定量研究者所采纳，即便他们批评皮尔逊所称的“快照式”因果推断，认为它不适于动态政治过程的分析（如 Blackwell 2013）。

民主党长期执政如何影响福利国家结果的研究。虽然一次选举结果不能塑造制度模式，但长期胜选会产生一种“棘轮”效应，即最初有争议的福利政策将变得根深蒂固，并构成后续政策辩论的出发点。再举一个强调速度的例子：马克·贝辛格（Mark Beissinger 2009）用事件数据和个案研究探讨了柏林墙倒塌后接踵而至的一些但非全部共产主义政权倒台的动力学。他提请大家注意“连续不断的活动，即一个处境中的行动深刻地影响了其他处境中的行动”，产生了在不同国家以不同速度展开的变革风潮（Beissinger 2009, 1）。

正如“原因”具有能影响最终结果的时间维度，“结果”同样具有对政治分析很重要的时间结构。关于反馈效应的文献主要的经验教训之一是，政治学家所感兴趣的现象可能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出现（Pierson 2004）。例如像引入补充性（私人）退休账户这样的政策的政治影响，只有随着登记人数的增加和越来越多的公民在财政上与政治上投入其中，这些计划的影响才会逐渐显现（Hacker 2005; Jacobs 2012）。

在本书中，哈克、皮尔逊和西伦考察了在大多数政治学分析中甚少提及的两类渐进变化的关键特性。他们将漂移和转换描述为行动者可以悄悄地促成政治结果中出现显著变化的策略，在表面上制度稳定性掩饰之下，其效应只会缓慢浮现出来。若政策或机构被故意保留下来，即便更广泛的政治或经济处境所发生的转变改变了这些政策或机构的影响——例如像人口或技术变迁使现有监管体制失效——漂移便会发生。事实上很明显，这些过程的政治后果只有当人们采用长时间视野时才能被观察到。与之类似，现行制度和政策的转换只能逐步进行，从而促成那些与建立这些制度和政策的初衷彻底不同的目标，例如通过对现有规则作新法律解释的点滴积累，或将旧规则应用于新问题。

通过聚焦于因果过程与效应的时间结构，比较历史分析学者发起了一场关于制度变迁典型模式的广泛对话。一些关于路径依赖的著作提请人们注意一种不连续的变迁模式——短暂的快速转型之后会有一个漫长的稳定期。比较历史研究便很适合研究此类发展，因为它关注对紧要关头和长期因果模式的分析。然而与此同时，另一些比较历史分析研究则强调了各种缓慢移动的过程，它们并不会引起这类被称之为间断均衡式的变迁（如 Pierson 2004）。这些研究表明，渐进式变化是政治世界中极为常见的制度演进方式（Thelen 1999, 2003, 2004），这样一来，学者们现在也常常考虑这些在路径依赖约束下，以渐增式变化为显著特征的长期过程。

近来对渐进式制度变迁过程的关注激发出了新的重要理论和经验研究文献（Mahoney and Thelen 2010a; Streeck and Thelen 2005）。这一类文献既包括识别渐进变化的典型方式（例如分层、漂移和转换），也包括提出关于特定类型变化原因的假说。新研究提供了组态式解释，把结构处境与特定类型的行动者结合起来，产生了特定的渐进转型模式（Hacker, Pierson, and Thelen, 本书第 7 章; Mahoney and Thelen 2010b）。比较历史分析处于探索渐变的前沿，这并非巧合：若要“看到”点滴渐增变化如何能累积为显著的转型，就需要人们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特有的长时间视野。仅聚焦短期效应的各种研究路径，只会对此类逐步展开的制度变迁模式视而不见。

互补与权衡

关注时间性议题的并非只有比较历史分析。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政治学整体上便见证了一场或可视为“时间革命”的运动，比较历史分析本身就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发起者。政治学中的时间革命反映了广泛的呼声，要对以横截面的、一次性的、快照的方式看待政治的诸多缺陷要有所反应（例如参见 Hall 2003; Pierson 2004）。

这一运动的后果显而易见：它使时间分析进入了政治学的主流。来自各方法论分支流派的学者，都把“时间”置于政治分析中心的位置。^①

由日益聚焦时间性而孕育出来的创新，在各种研究路径上表现各异，但它们往往彼此补充，在认可时间与历史对政治研究很重要的观念上趋同。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比较历史分析学者放大了对长期主题的关注，引入了新的工具来研究时机、排序和时间结构。统计研究者通过开发新的纵列数据处理技术，让时间序列截面分析方法成为标准，以及改进立足贝叶斯统计的新工具，为这场革命做出了贡献（如 Beck 2008; Blackwell 2013）。伴随着这些变化，统计研究者越来越多地提出有关“历史”原因的效应的问题，如殖民主义、早期国家形成以及过去的民主经历。为进行检验，这些研究者借助新的数据集，往往对过去老早的个案作编码。博弈论理论家则创造了新的迭代和演化方法以严格考虑战略选择的次序，并在其中将次序和时机置于重要地位（如 Smith and Price 1973; Weibull 1997）。一些博弈论理论家也开始对提出历史导向的问题和在研究中使用历史资料感兴趣。作为上述发展的结果，“分析叙事”方法（Bates et al. 2000）和格里夫（Greif 2006）等经济学家的历史分析与比较历史分析类的研究工作也并行不悖。

然而，目前的学科趋势有可能使这场时间革命的成就化为乌有。许多长期因果过程，我们明知对大量政治问题极为重要，但却经不起主要聚焦于短期过程的方法的检验。不幸的是，大多数实验性工作，把我们拉回到完全是在短时期内展开的因果过程与结果的分析上。在这些研究中，时间是静止的，因为只有当干预措施足够近似于排除其他可能的干预变项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分离出处理的效果。结果便是

^① 社会学家亦参与了这一发展并做出了贡献。与此相反，这一趋势在经济学中并未产生深远影响，即便有些特例。托马斯·皮凯蒂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2014）一书中出现的某些最引人瞩目的发现，只不过是把他把当前时期置于更长时间框架之中。该书也表明，如果我们将目光从作为主流经济学特色的微观视角中抽离，转而追踪随时间展开的宏观过程，便能看到很不一样的模式。

再次缩窄了我们的视野，因为学者们瞄准在某一特定干预措施的即时影响上，而将大尺度的制度、人口和经济趋势排除在视野之外。^①

同样重要的是，一次性处理往往产生一些发现，但这些发现系统地忽略了一些历时展开的因果过程，而它们又影响到这些实验旨在探索的那些真正结果。在那些试图在缺少土生土长的参与或民主制度的处境中查实“参与”或“民主”的影响的实验之中，这个问题尤其容易弄出污点（例如 Grossman and Baldassarri 2012; Gugerty and Kremer 2008; Khwaga 2009）。许多这样的实验（通过处理）引入民主或参与实践，以检验它们对当地政治动态的影响。其效应有时会达到统计上显著，但往往其实质影响非常小，且持久性几乎总是值得怀疑的。即便是最认真的处理干预措施，经常也只不过会得到不显眼且混杂的结果。例如，想想最近在阿富汗发展倡议背景下进行的一项传统宗教保守环境中民主参与和性别关系的研究。处理方式是指令女性加入村委会，看看这种形式的参与是否会导致妇女被赋予更大的权力。虽然在自报的对于女性政治参与的态度上，这些举措确实造成了些许改进，但它们并没有在“更为根深蒂固的女性角色……或对妇女在社会中的一般性角色的态度”上产生任何改变（Beath, Christia, and Enikolopov 2013, 540）。

这类研究对项目评估目的而言还是有价值的。例如，这一案例中所强调的当地制度在面对第三方干预时的弹性。然而，从更注重过程的视角来看，观察到的结果是可预见的。当制度被引入（处理风格）到一个新的处境中，它们不太可能精确地产生影响，因为这些制度自身浮现的过程同样至关重要。民主制度赖以达成的内生政治过程（从历史上讲，往往涉及持续的冲突和斗争），正像制度本身一样，造就了最终效果——由此，这些过程将改变公民的预期，并重新配置社会和政治动力（Baiocchi, Heller, and Silva 2011）。

^① 虽然实验研究者们通常并不关心可能的长期原因，但他们确实担心其实验结果是否具有持续性，因为它会导致很多实验处理的效应相对快速地衰退（如 Druckman and Leeper 2012）。因此，就多数实验研究而言，几周或者个把月就算得上是一种新的“长时段”了。

围绕理解短期过程和结果而组织起来的研究在本学科中有一席之地。然而，拥抱那些忽略长期过程和因果关系的政治研究路径，代价巨大。正如皮尔逊（Pierson 2004, 81）所指出的，没有理由认为，最重要或最有趣的政治动态，可以被拘泥于短期时间结构的说辞捕捉到。再极度缩小我们的视野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因为那些只有在长时期内才会逐步展开的原因和结果会落在视线之外，研究者的注意力会更狭隘地聚焦在一些变项上，尽管它们与我们感兴趣的结果在时间上很接近，但在解释这一结果时，其实或许只起到了相对次要的作用（Pierson 2004, 101-2）。

四、结论

本文把比较历史分析的弹性与活力归于界定这种方法的核心特征。在政治学方法论争论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比较历史分析的优势之一便是其适应性，它源于一种在实质性议题上与其他研究路径的学者保持接触的开放态度，从而实现优势互补。比较历史分析和大样本研究在某些方面是最自然的互补品。比较历史分析的优势（内部有效性）与大样本研究的优势（外部有效性）互为镜像，因此这两类研究尤其能够以富有成效的方式相互借鉴对方的研究发现。^① 我们看到比较历史分析与实验研究的互补性总体上较少，部分原因是这一学术路线的优势（内部有效性）与其弱点（外部有效性）与比较历史分析的优势和弱点基本相同。虽然我们担心实验研究有收窄我们的研究项目和时间视野的趋势，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与准实验设计（自然实验、匹配、断点回归）潜在的协同效应，并且能想象到实验研究或可有助于检验比较历史分析各种理论之中的特定模块。同样，大数据也可能成为比较历史分析的有益补充，比如，学者可有效利用新的可能性去速览和分析历史及其他资

^① 但请参见斯莱特和吉布莱特（Slater and Ziblatt 2013）稍许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受控案例比较”——我们认为这与比较历史分析有关——在内部和外部有效性上都挺强，而且他们还注意到在多重方法研究中，案例比较通常用于确立外部有效性，而非内部有效性。

料。比较历史分析的兴旺部分是因为它很务实，且这个领域一定会保持开放态度，乐于吸纳其他学术路线中可能出现的任何有助于回答宏观层面问题的洞见。

不过与此同时，比较历史分析有很稳健，因为这一传统中最出色的作品仍然忠实于把它与经典作品联系起来的若干核心特征，这些特征仍旧将比较历史分析定义为这样一种研究路径——它聚焦于宏观组态式解释，它强调基于个案的深入研究，以及它关注政治的过程与时间维度。尽管我们处于阐述的目的把这三个维度分开讲，但它们实际上显示了很强的互补性，因而它们在比较历史分析研究的实际操作中紧密相连。宏观组态式解释往往具有很强的时间维度，因为相干事件的时机和排序构成了产生相关结果的处境的一部分。同样地，基于个案的深入研究有利于识别不同变项与过程之间的因果机制和交互作用，因为这些都是时间在时间中展开的。我们认为，无论单独来看还是结合起来看，界定了比较历史分析的这些核心特征，赋予了这种研究路径相对于其他视角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认为，从这一学术流派中涌现出的独特洞见，强有力地促成了比较历史分析持久的思想吸引力和更大的学科影响，而运用不同研究工具的另一一些学者也跟进由比较历史分析学者发起的若干研究议程。

最终，我们的观点是，最富有成效的研究共同体并不是那些由某种特定技术来界定的人群，而是或许掌握了各式各样的方法、为从实质上理解重大问题这一共同愿望而团结起来的学人。来自不同研究传统的学者当然不一定要完全同意彼此的看法。然而，只要他们共同关心解决具有持久重要性的各种重大问题，兼顾微观过程与更广泛的结构因素，他们就能够注意到彼此的研究发现，并在自己的工作中加以运用、与之争鸣。

【参考文献】

- Abbott, Andrew. 1997. "Of Time and Space." *Social Forces* 75 (4): 1149–82.
- . 2001. *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6.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lexander, Gerard. 2001. "Institutions, Path Dependence,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3 (3): 249–70.
- Amenta, Edwin. 2003. "What We Know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olicy: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91–13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minzade, Ronald. 1992. "Historical Sociology and Time."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20:456–80.
- Baiocchi, Gianpaolo, Patrick Heller, and Marcelo K. Silva. 2011. *Bootstrapping Democracy: Transforming Local Governance and Civil Society in Brazi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tes, Robert H., Avner Greif, Margaret Levi, Jean-Laurent Rosenthal, and Barry Weingast. 2000. "The Analytic Narrative Proje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 (3): 696–702.
- Beath, Andrew, Fotini Christia, and Ruben Enikolopov. 2013. "Empowering Women through Development Aid: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Afghanista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 (3): 540–57.
- Beck, Nathaniel. 2008. "Time-Series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In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edited by Janet Box-Steffensmeier, 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475–9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issinger, Mark R. 2009. "Nationalism and the Collapse of Soviet Communism."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18 (3): 331–47.
- Bennett, Andrew. 2008. "Process Tracing: A Bayesian Perspectiv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edited by Janet Box-Steffensmeier, Henry E. Brady, and David Collier, 217–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lackwell, Matthew. 2013. "A Framework for Dynamic Causal Inference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7 (2): 504–20.
- Boas, Taylor. 2007. "Conceptualizing Continuity and Change: The Composite-Standard Model of Path Dependenc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9 (1): 33–54.

- Broockman, David. 2012. "The Problem of Preferences: Medicare and Business Support for the Welfare State."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26 (2): 83–106.
- Büthe, Tim. 2002. "Taking Temporality Seriously: Modeling History and the Use of Narratives as Evid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 (3): 481–94.
- Callander, Steven, and Keith Krehbiel. 2013. "Gridlock and Deleg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Unpublished manuscript, March 1. Stanford Business School.
- Capoccia, Giovanni, and Daniel Keleman. 2007. "The Study of Critical Junctures: Theory, Narrative, and Counterfactuals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World Politics* 59 (3): 341–69.
- Centeno, Miguel Angel. 2003. *Blood and Debt: War and the Nation-State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Park: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ioffi, John W. 2010. *Public Law and Private Power: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Reform in the Age of Finance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Coleman, James S. 1990.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ollier, Ruth Berins, and David Collier. 1991.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tical Juncture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eaton, Angus. 2010. "Instruments, Randomization, and Learning about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8 (2): 424–55.
- . 2014. "Instruments, Randomization, and Learning about Development." In *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ir Critics: Essays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Experiment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Dawn Langan Teele, 141–84.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ruckman, James, Donald P. Green, James H. Kuklinski, and Arthur Lupia, eds. 2011. *Cambridg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ruckman, James N., and Thomas Leeper. 2012. "Learning More from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xperiments: Pretreatment and Its Effec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6 (4): 875–96.
- Dunning, Thad. 2012. *Natural Experimen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ckel, Catherine D., Enrique Fatas, and Rick Wilson. 2010. "Cooperation and Status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12 (4): 737–62.
- Elster, Jon. 1982. "The Case for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11 (4): 453–82.
- Falleti, Tulia G. 2010. *Decentralization and Subnational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alleti, Tulia G., and Julia F. Lynch. 2009. "Context and Causal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2 (9): 1143–66.
- Friedman, Jeffrey. 1996. *The Rational Choice Controvers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ukuyama, Francis. 2013. "Albert O. Hirschman, 1915–2012." *The American Interest* (March/April): 93–95.
- Gerber, Alan S., Donald P. Green, and Edward H. Kaplan. 2014. "The Illusion of Learning from Observational Research." In *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ir Critics: Essays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Experiment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Dawn Langan Teele, 9–32.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one, Jack A. 2003.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the Study of Revolutions."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41–9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een, Donald P., Shang E. Ha, and John G. Bullock. 2010. "Enough Already about 'Black Box' Experiments: Studying Mediation Is More Difficult Than Most Scholars Suppos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28:200–8.
- Green, Donald, and Ian Shapiro. 1994. *Pathologies of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 Critique of Applic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Greif, Avner. 2006.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Lessons from Medieval Trad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ossman, Guy, and Delia Baldassarri. 2012. "The Impact of Elections on Cooperation: Evidence from a Lab-in-the-Field Experiment in Ugand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6 (4): 964–85.
- Grzymala-Busse, Anna. 2011. "Time Will Tell? Temporality and the Analysis of Causal Mechanisms and Process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4:1267–97.
- Gugerty, M. K., and M. Kremer. 2008. "Outside Funding and the Dynamics of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y Associ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585–602.
- Hacker, Jacob. 2005. "Policy Drift: The Hidden Politics of US Welfare State Retrenchment." In *Beyond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 edited by Wolfgang Streeck and Kathleen Thelen, 40–8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cker, Jacob, and Paul Pierson. 2010. "Drift and Democracy: The Neglected Politics of Policy Inac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2–5.

- Haggard, Stephan, and Robert R. Kaufman. 2012. "Inequality and Regime Change: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Democratic Rul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 (3): 495–516.
- Hall, Peter. 2003. "Aligning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373–40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6. "Systematic Process Analysis: When and How to Use It." *European Management Review* 3:24–31.
- Hall, Peter, and David Soskice.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dgson, Geoffrey M. 2007. "Meanings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14 (2): 211–26.
- Huber, Evelyne, and John D. Stephens. 2001. *Development and Crisis of the Welfare State: Parties and Policies in Global Marke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uber, John. 2013. "Is Theory Getting Lost in the 'Identification Revolu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ist: Newsletter of the Section on Political Economy* 10 (1): 1–3.
- Imai, Kosuke, Luke Keele, Dustin Tingley, and Teppei Yamamoto. 2011. "Unpacking the Black Box of Causality: Learning about Causal Mechanisms from Experimental and Observational Stud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 (4): 765–89.
- Iversen, Torben, Jonas Pontusson, and David Soskice. 2000. *Unions, Employers, and Central Banks: Wage Bargaining and Macroeconomic Regimes in an Integrating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Iversen, Torben, and David Soskice. 2001. "An Asset Theory of Social Policy Preferenc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5 (4): 875–93.
- . 2006. "Electoral Institu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Coali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 (2): 165–81.
- Jacobs, Alan M. 2012. *Governing for the Long Term: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Invest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am, Cindy D., and Robert J. Franzese Jr. 2007. *Model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ve Hypotheses in Regression Analysi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Khwaga, A. I. 2009. "Can Good Projects Succeed in Bad Communiti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3(7–8): 899–916.

- King, Gary. 2014. "Restructuring the Social Sciences: Reflections from Harvard's Institute for Quantitative Social Scienc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47 (1): 165–76.
- Kohli, Atul, ed. 2001. *The Success of India's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A. Way. 2010.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Hybrid Regim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ijphart, Arend. 1971. "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 (3): 682–93.
- Little, Daniel. 2012. "Explanatory Autonomy and Coleman's Boat." *Theoria* 74:137–51.
- Lukes, Steven. 1968.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19 (2): 119–29.
- Mahoney, James. 2000. "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29:507–48.
- . 2001. *The Legacies of Liberalism: Path Dependence and Political Regimes in Central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 2003. "Knowledge Accumulation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Research: The Case of Democracy and Authoritarianism."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131–7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12. "The Logic of Process Tracing Test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 41:566–90.
- Mahoney, James,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2003.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honey, James,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2010a.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honey, James, and Kathleen Thelen. 2010b. "A Theory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edited by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1–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es, Isabela. 2003. *The Politics of Social Risk: Business and Welfare State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Cathie Jo, and Duane Swank. 2004. "Does the Organization of Capital Matter? Employers and the Active Labor Market Policy at the National and Firms Level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 (4): 593–611.
- Morton, Rebecca B., and Kenneth C. Williams. 2010. *Experimental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Causality: From Nature to the La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Donnell, Guillermo. 1973. *Modernization and 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Pierson, Paul. 2000. "Increasing Returns,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4:251–67.
- . 2004.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2007. "The Costs of Marginalization: Qualitative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American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0 (2): 146–69.
- Pierson, Paul, and Theda Skocpol. 2002.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In *Political Science: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edited by Ira Katznelson and Helen Milner, 693–721. New York: W. W. Norton.
- Pi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Ragin, Charles C. 1987. *The Comparative Method: Moving Beyond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trateg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ixen, Thomas, and Lora Anne Viola. 2014. "Putting Path Dependence in Its Place: Toward a Taxonom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26 (3):1–23.
- Rueschemeyer, Dietrich, and John D. Stephens. 1997. "Comparing Historical Sequences – A Powerful Tool for Causal Analysis." *Comparative Social Research* 17:55–72.
- Rueschemeyer, Dietrich, Evelyne H. Stephens, and John D. Stephens. 1992.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hickler, Eric. 2001. *Disjointed Pluralism: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 Congres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ekhon, Jasjeet S., and Rocío Titiunik. 2012. "When Natural Experiments Are Neither Natural Nor Experimen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 (1): 35–57.
- Shapiro, Ian. 2004. "Problems, Methods, and Theorie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or: What's Wrong with Political Scienc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In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s*, edited by Ian Shapiro, Rogers Smith, and Tarek Masoud, 588–611.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14. "Methods Are Like People: If You Focus Only on What They Can't Do, You Will Always Be Disappointed." In *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ir Critics: Essays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 Experiment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Dawn Langan Teele, 228–42.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heda. 1992. *Protecting Soldiers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kowronek, Stephen. 1982. *Building a New American State: The Expansion of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Capacities, 1877–192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later, Dan, and Erica Simmons. 2010. “Informative Regress: Critical Antecedent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3:886–917.
- Slater, Dan, Benjamin Smith, and Gautam Nair. 2014. “Economic Origins of Democratic Breakdown? The Redistributive Model and the Postcolonial State.”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353–72.
- Slater, Dan, and Daniel Ziblatt. 2013. “The Enduring Indispensability of the Controlled Comparis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6 (10): 1301–27.
- Smith, J. Maynard, and G. R. Price. 1973. “The Logic of Animal Conflict.” *Nature* 246 (5427):15–18.
- Soifer, Hillel David. 2012. “The Causal Logic of Critical Juncture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5 (12): 1572–97.
- Stokes, Susan. 2014. “A Defense of Observational Research.” In *Field Experiments and Their Critics: Essays on the Uses and Abuses of Experiment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Dawn Langan Teele, 33–57.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treeck, Wolfgang, and Kathleen Thelen. 2005. “Introduc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 In *Beyond Continuity: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dvanced Political Economies*, edited by Wolfgang Streeck and Kathleen Thelen, 1–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wenson, Peter. 1991. “Bringing Capital Back In, or Social Democracy Reconsidered: Employer Power, Cross-Class Alliances, and the Centralization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in Denmark and Sweden.” *World Politics* 43 (4): 513–44.
- . 2002. *Capitalists against Marke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helen, Kathleen. 1999.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369–404.
- . 2003.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Insights from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edited by 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208–4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2004. *How Institutions Evolv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udor, Maya. 2013. *The Promise of Power: The Origins of Democracy in India and Autocracy in Pakist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ogel, Steven K. 2006. *Japan Remodeled: How Government and Industry Are Reforming Japanese Capit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eibull, Jörgen W. 1997.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Weir, Margaret. 1992. *Politics and Jobs: The Boundaries of Employment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Woolcock, Michael. 2013. “Using Case Studies to Explore the External Validity of ‘Complex’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s.” *Evaluation* 19 (3): 229–48.
- Yashar, Deborah. 2005.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Latin America: The Rise of Indigenous Movements and the Postliberal Challe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iblatt, Daniel. 2009. “Shaping Democratic Practice and the Causes of Electoral Fraud: The Case of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3 (1): 1–21.
- . 2017. *Conservative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 i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